

史可法評價問題彙編

「輯自一九六六年上海文滙報」

說 明

- 一、本書內容係根據一九六六年上海文匯報着手編成其中如有關於史可法問題之論著無不皆已搜錄詳盡
- 二、凡錄入之資料均已分別註明其來源日期及版面故倘認為書內某篇如有置疑而另需購影印版參考對照時誠亦亟表歡迎至該影印版取價係按每版港幣五元五角計算
- 三、本書之特點乃以分類資料方式編集且內容全屬原文真跡既無主觀成見亦非斷章取義此在中外學者不但因此免去若干查閱資料上之費時費事且較之影印版難以長期收藏自亦為其特色之一
- 四、自一九六八年九月份起按月均有新書一二種陸續發行如承函洽敬希函賜下開地址即可：
楊開書報供應社 香港郵政信箱九五八號
O, K, NEWSPAPER AGENCY, G, P, O, BOX 958
HONG KONG

目 錄

應該怎樣評價史可法

——評中國歷史小叢書「史可法」

劉 輝 1

史可法是「民族罪人」嗎？

——與劉輝同志商榷

林 父 19

關於歷史上民族英雄的評價問題

——兼論史可法

羅 威 33

有關評價史可法的兩個問題

——劉輝「應該怎樣評價史可法」讀後

李 田 43

史可法三評

丁家桐 51

從「桃花扇」談起

——評史可法

宗志黃 59

史可法的“英雄”偶像是誰捧起來的？

佛 雛 69

南京學術界舉行關於史可法問題討論會

79

墨塗的「功績」掩蓋不了血染的罪孽

忻才良 87

希望張習孔同志參加討論

秦 明 90

信 稿 摘 編

史可法抗清屬於人民的範圍

93

怎能說是「民族罪人」？

94

「史可法」內容顛倒是非

95

史可法是屠殺農民革命軍的劊子手

97

我上了吳晗、張習孔的當

98

史可法之死不值得讚揚

99

鎮壓農民軍是史可法的本性

101

讀「史可法是『民族罪人』嗎？」一文的幾點質疑

102

四點質疑

103

關於民族英雄

105



S9003981

應該怎樣評價史可法

——評中國歷史小叢書「史可法」

「史可法」：吳 晗主編 張習孔編寫 中華書局出版

「史可法」內容提要：史可法是我國明朝末年著名的民族英雄。清兵入關以後，史可法在江南人民的積極支援下，爲了保衛國家和民族，不計較個人權位，不爲威屈，不受利誘，組織力量對進犯的清軍進行堅決的鬥爭，給以狠狠的打擊，終於以身殉國，表現了崇高的民族氣節。這本書敘述的就是史可法堅決進行抗清鬥爭的經過事跡。（原載中國歷史小叢書“史可法”，一九五九年六月第一版。）

劉 輝

本文內容提要：「史可法」是按照封建主義、資產階級的觀點編寫的，完全違背了用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評價歷史人物的準則。史可法是一個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他的一生，是殘酷屠殺革命人民的一生。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年代，他又扮演了絞殺人民抗清主力軍的角色，背叛民族利益，鼓吹“安內攘外”政策，與清封建統治者聯合一起，瘋狂地鎮壓抗清的農民軍。史可法最後懷着沒有有效地消滅掉農民軍的“遺恨”，爲忠於朱家王朝而死，當了明代封建統治的殉葬品。“愛國主義”、“民族英雄”，有它歷史的具體的階級的內容。「史可法」一書，完全拋開了這一點。它的出現，不是一個個別的偶然的現象，而是吳晗、張習孔等人極力歌頌帝王將相、頌揚“清官”、“好官”，狂熱宣揚封建道德可以繼承理論的產物，是一股反馬克思主義的復古主義思潮的產兒。必須嚴肅地認真地徹底地進行批判！

從一九五八年開始，吳晗同志主編的中國歷史小叢書，陸續出版了幾十種，在讀者中廣泛流傳。根據已出版的內容來看，其中有不少部分，是對封建社會的帝王將相的歌頌，狂熱地宣揚了封建官吏的“好品德”。他們硬說通過這些帝王將相能夠向廣大的人民群眾“進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和共產主義品德教育”，（“中國歷史小叢書”編寫計劃。）散佈了十分有害的毒素，需要我們今天嚴肅地認真地進行批判。張習孔編寫的「史可法」就是其中的一種。

歷來的封建文人、資產階級學者，舞文弄墨，寫詩作文，對史可法的“忠”推崇備至，連清代的最高封建統治者——乾隆皇帝，也諡他“忠正”，而且在史可法的遺像上御筆親題“褒慰忠魂”四字。吳晗同志主編的中國歷史小叢書中的「史可法」（張習孔編寫，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六月出版，以下引文不注出處者，皆見此書），正是因襲了這些觀點編寫的。全書近兩萬言，全面地歌頌了史可法，說他三百多年來“一直被人民懷念着，歌頌着”。“史可法的忠魂將永遠和梅花嶺上的寒梅爭輝；史可法的英名將永遠和我國歷史上的民族英雄岳飛、文天祥、鄭成功等並列，放射出不朽的光芒。”在作者的筆下，史可法是偉大的不朽的英雄，被視為古今第一完人，以至於作者無法找出一個字、一句話來批評他。這真是一個罕見的現象，作為一個封建統治集團的高級官吏，他的思想、行動，到了社會主義的今天，竟然可以被全盤繼承，而沒有任何值得批判指責的地方，豈不怪哉！這也是他們最近幾年來在鼓吹封建道德可以繼承的理論上為讀者拿出的一個樣品，可惜，這個樣品是蹺腳的。人們不能不問：這究竟是站在哪個時代，立足於哪個階級的立場來這樣評論歷史人物呢？尤其是對於一生沾滿了農民革命軍鮮血的劊子手史可法來說，這

樣的歌頌更加悖謬，更是一個原則性的錯誤。

我們認為，歷史上的史可法，是一個痴心忠君的封建士大夫典型人物。他的政治觀點是非常反動的，盡管他最後沒有降清，這只不過表明他忠君忠得更加徹底而已！如果從他一生的實際的政治活動來看，他是對國家對民族負有大罪的人。人民、民族，在他腦子裡是非常淡薄的；君、皇帝老子，才是他全部靈魂的寄托。

(一) 用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評價歷史人物

歷史是勞動人民創造的，人民群眾決定了它的發展方向。歷史上的帝王將相（包括史可法在內）只不過在一定的範圍內，對社會生產力水平的發展起推動或阻滯作用罷了，評判他們的功過，只能是根據他們全部的政治活動在這方面所產生的實際結果。甚麼是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呢？“在中國封建社會裡，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因為每一次較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六一九頁。）因此在觀察、分析、判定歷史人物的功過時，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從當時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來評價他們的功過得失。尤其重要的是以無產階級鬥爭的觀點來考察歷史和歷史人物。無產階級除了按照當時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運用階級分析的原則，還歷史人物以本來的面目之外，還必須根據本階級的利益，來檢驗這些人物的思想、行動，對今天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說來，起了甚麼樣的作用、影響，然後決定對他的取捨態度。「史可法」的編者恰恰違背了這些根本點，他們不僅歪曲了歷史真實，掩

蓋了史可法對民族對人民所犯下的血腥罪行，同時又毫不負責任地把封建統治階級的思想觀念、行動准則，全盤推薦給今天的讀者。如果考慮到中國歷史小叢書的讀者主要是社會主義建設者——工農群眾和革命的接班人——青少年讀者的話，這個影響就更加惡劣，爲害也就更大。

(二) 史可法是鎮壓農民革命的“英雄”

史可法生活在十七世紀的前半期，正是明帝國走向衰敗崩潰的末期。這是一個政治上極端腐朽反動的時代，明王室的封建統治者窮奢極慾，苞苴恣行，對人民進行了殘酷掠奪。土地兼並之烈，達到封建社會驚人的地步，皇室貴族，搶佔良田，少者一、二萬頃，多者竟達四萬頃；地主縉紳之家，小者五、七百頃，大者千餘頃（“豫變紀略”）。而橫征暴斂，尤爲瘋狂，稅、兵、刑、力、官吏、豪強，一齊傾壓到人民身上，剝膚吸髓，榨取罄盡。數以百萬計的農民被迫破產流離，瀕於死亡的邊緣，各地相繼出現了“人相食”的慘事。社會經濟遭到了極其嚴重的破壞。正是這個極端黑暗的年代，激起了人民反抗的怒火，農民起義以暴風驟雨之勢席卷全國，出現了我國歷史上空前規模的農民革命。假如從天啓七年（一六二七）王二領導的農民起義算起，農民軍經過近二十年的壯烈鬥爭，輾轉十數省，最後徹底推翻了反動的明代封建王朝，打碎了禁錮在他們身上的封建鎖鐐。在這場長期偉大的革命鬥爭中，出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農民英雄，他們面對着強大的封建統治機構，毫無畏懼，進行了浴血的鬥爭，以自己的頭顱和鮮血推動了歷史車輪的前進。然而反動的明末封建統治者，爲了維護他們的階級利益，對農民革命進行了殘暴的反撲，

採取了“招撫”誘騙的毒辣手段和“急剿”血腥鎮壓相結合的政策。不管他們有多少反革命的技倆，也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挽回他們垂死的命運。

史可法正好生活在這個階級鬥爭極端尖銳的年代。在革命與反革命，兩個階級森嚴對壘地進行着殊死的戰鬥中，史可法是站在哪一邊呢？從他進入社會政治活動開始，直到他臨死為止，以他自己的話說：“無日不以賊爲事。”（“史忠正公集”卷二）他的反動立場不可謂不堅定，旗幟也不可說不鮮明。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鎮壓農民軍的劊子手，在他的手上沾滿了農民革命戰士的鮮血。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鐵的事實。

崇禎元年（一六二八），史可法去西安府任推官，開始了他的宦途生活。剛一走馬上任，就扮演了絞殺農民軍的角色，“史可法有文武材，初授西安府推官，已能平劇盜。”（溫浚臨：“南疆逸史”卷五。）陝西是農民起義的發源地，一六二八年，陝西的農民起義已風起雲湧，王嘉胤、高迎祥等佔領陝北、陝中地區。（崇禎長編）農民革命的氣勢使明代統治者大爲震驚。作爲小小推官的史可法，爲了效忠他的封建主子，參與了鎮壓農民起義的行動，而且很快顯露了他的“才幹”，升遷到中央政府任戶部主事、員外郎郎中。一六三五年秋天，他到了戰鬥劇烈的江淮一帶，以副使銜與總理侍郎盧象昇共同與農民軍作戰。僅是短短幾年的時間，史可法升遷如此之快，變成了鎮壓農民運動的主要人物之一，這正是他的反動“業績”的最好佐證。一六三五年，在明末農民軍的發展史上是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一年，十三家七十二營的農民軍首領大會於河南滎陽，取得了全國革命勢力的空前團結，共同確定了戰略計劃，步調一致，合力進擊，徹底打破了明政府軍各個擊破的陰謀，把農民革命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

按照會議的商定計劃，李自成、張獻忠、高迎祥等率兵東征，進軍江淮。這是一次具有偉大戰略意義的進軍，可以摧毀明朝的經濟生命綫，把富庶的江南地區和北方的中央王朝從中切斷，隔絕其間的物資供應。這時，和農民軍作戰的主要對手之一就是史可法。爲了保衛這條重要的經濟命脈，史可法在一六三五年以前，就自願請命，前往這個戰場。“時史公任比部郎，奮然起曰：‘國家養士，原爲社稷封疆計，今若此，非所以報主知也’。自請往。至皖，日不暇給，築城濬濠，措餉募兵，月餘得八百人，雖訓練未深，而戰守有恃，皖遂爲江北一重鎮矣。”（張斯善：“功德記”，見“史忠正公集”卷末。）後來任副使，統轄江北重兵，在潛山、安慶、鳳陽、桐城、太湖各地殘酷鎮壓農民軍，僅安慶一戰，農民軍死傷近萬人。（計六奇：“明季北路”卷十三。）“江北爲賊衝，公與賊大小數十百戰，保障江淮”。（“乙酉揚州城守紀略”）由於他的“戰功”累累，“大小數十百戰”，“戰必身先士卒”，崇禎皇帝大爲賞識，接連提升爲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理總督漕運，一直爬到陪都南京的兵部尚書的要職，指揮所有江南的政府軍隊。他的每一次升遷，都在農民軍身上欠下了一筆血債，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據他自己說，僅在南京一地，就親自督造過屠殺農民軍的紅彝大砲等武器不下數千件。（“史忠正公集”卷一，“請頒敕印給軍需疏”。）然而“史可法”的編寫者對於史可法這段歷史却說成是“清正勤懇的好官”，“因爲他辦事認真，不多幾年就逐步升爲中央政府的高級官員”。不僅一筆勾銷他犯下的血腥罪行，反而頌揚他“爲官清正，勤懇奉公”，“就因爲他有這樣愛惜人民的一面，所以他雖然做着明朝的大官，爲封建統治階級服務，可是一般人民都還對他表示同情。”這裡的“人民”究竟指的是誰呢？把史可法對

革命人民的殘酷鎮壓，說成是“爲官清正”，“辦事認真”，難道屠殺農民“認真”，也值得歌頌一番嗎？這究竟是站在哪一個階級的利益上說話呢？不錯，封建社會的“清官”的“清”，在政治上正表現了他們對封建王朝的忠心耿耿，爲了鞏固封建統治，他們不能不對農民革命抱有刻骨的階級仇恨，這正是“清官”反動性的集中表現。你們抬出史可法來，作爲吹捧“清官”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好官”、是“人們的救星”的理論的例證，竟然把“清官”對農民革命的血腥鎮壓，也算是“清官”的一大功德，這不正好說明你們的“清官”理論是虛偽的站不住腳的東西嗎？歷史是無情的，是任何人都不能隨意捏造或輕易掩蓋得了的。任何顛倒黑白，混淆階級界綫的說法都會在歷史真實的面前碰得頭破血流。

（三）史可法是絞殺抗清主力軍的“英雄”

不論史可法如何竭盡心血，爲他的封建主子出謀畫策，也不論他多麼“戰必身先士卒”，但是他根本不能挽救明帝國的最後崩潰。英雄的農民軍在全國人民的熱烈支持下，於一六四四年破居庸，進昌平，攻下北京，完成了推翻封建統治的宏偉壯舉。人民設香案於道旁，用黃紙書寫“大順永昌皇帝萬歲萬萬歲”歡呼勝利。（趙士錦“甲申紀事”。）然而，正在這個勝利的時刻，形勢急轉直下，新起的滿族統治者入侵進關，民族敵人嚴重地威脅着他們的存在。由於漢奸吳三桂等引狼入室，以及其他歷史原因，農民政權在北京僅存一月有餘，就被迫西撤南下。當時的明末社會出現了極其錯綜複雜的階級關係：一方面，民族矛盾取代了國內階級矛盾成爲社會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由於農民軍剛

剛消滅了明代封建統治，農民軍與殘留南方的朱家王朝地主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達到了空前的尖銳激烈。應當如何分析這一歷史時期階級矛盾的本質特點呢？在這個特定的時代環境下如何評價歷史人物的功過呢？這是在目前評論史可法中存在根本分歧的地方。

民族敵人的入侵，引起了社會主要矛盾的急遽變化。原來滅明的農民軍投入了一個嶄新的鬥爭環境，他們以國難爲己任，肩負保衛國家民族獨立的重擔，與清代封建統治者展開了一場更爲殘酷更爲激烈的民族鬥爭，成了抵抗外侮入侵的主力軍。這時，對於明代的地主階級說來，假如他們還有一絲一毫民族責任心的話，就應當放手讓農民軍進行抗戰，就應當在民族大難當頭之日，改變他們原來仇視農民軍的階級偏見，與抗戰主力軍取得暫時的相對的統一，這樣才可以舉國一致，收復大好山河。然而，封建統治階級的反動的階級本性，又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改變對農民革命的仇視行動。即使是統治階級裡的個別“有識之士”，提出與農民軍暫時地聯合，其目的也無非是借人民的鮮血，換取他們統治地位的存在。歷史證明，南明的統治集團仍然是在採取鎮壓農民軍的政策，甚至和民族敵人勾結一起，一前一後絞殺成爲抗戰主力的農民軍。在這個時候，這種行動本身就不僅僅是地主階級的階級局限了，而是實質上變成叛國的投降主義者，走着一條亡國的路綫。這種人，不僅稱不上什麼“愛國將領”、“民族英雄”，而是道道地地的民族罪人。因爲“只有這種人民戰爭，才能戰勝民族敵人。”（“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一〇四二頁。）“或者是人民的全面的戰爭，這樣就會勝利；或者是壓迫人民的片面的戰爭，這樣就會失敗”。（“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一〇三八頁。）具體到史可法來說，他在這個形勢下，提出了什麼建議，

採取了什麼行動呢？這不能不是檢驗他是否有愛國主義精神、是不是民族英雄的關鍵時刻。

史可法所走的正是一條亡國的路。祖國的大好河山，淪於敵手，他不急不忙，倒是泣血悲痛覆滅了的明代封建王朝，傾他的全力向農民軍來雪他的“君父之仇”，並且與民族敵人達成默契，前擊後堵抗戰的主力軍，爲民族敵人的入侵，开辟了進攻的道路。且看他的具體行動：

一六四四年五月清朝剛剛建國，李自成率主力從山西入陝。留在河北、山東一帶的農民軍政權仍然堅持抗擊清兵的入侵，堅持在第一綫作戰。這時一些極端反動的地主階級分子乘機而起，紛紛捉逮“僞官”前去南京獻功。時握宏光王朝兵權的史可法則與他們密通訊息，當他接到德州、青州地區“殺其僞將軍、僞道、僞府，其餘相繼殺僞官者十處”的“捷報”時，歡喜若狂，“臣讀未竟，不覺舉手加額，爲宗社生民慶也”。急請福王曉諭黃河以北的“異域”，大明仍在，鼓勵他們傾全力“掃三秦之餘孽”。（“史忠正公集”卷一，“請頒詔敕定人心疏”。）對於他直接管轄的江淮一帶，則糾集一二十萬暴徒向農民軍政權進行了反撲。（“史忠正公集”卷一，“請旌淮人忠義疏”。）一句話，他要盡速地消滅一切農民政權，爲他的主子“復仇”。正值史可法在江南一帶殘殺農民軍的同時，清軍分兩路向農民軍大舉進攻，主攻矛頭雖然指向山西、陝西，但是也對河北、山東、河南的農民軍展開了追擊，以便平定黃河北岸，鞏固他的後方（這個行動到一六四四年十一月才完成）。這時，遭到清兵和地主武裝進攻的一部分農民軍不得已從前方撤退到黃河沿岸。當時統四鎮駐守揚州的史可法，對於民族敵人瘋狂地屠殺抗戰主力農民軍，他觀戰猶不足興，而是指揮所有軍隊，東起沿海，西至河南築起

了一條堵截農民軍後退的防綫，就是所謂的防河政策。須知，他防的並不是什麼清兵，而是抗清的農民軍。他自己說得明明白白：“我之大仇在寇，不寇是討而敵是防，已非微臣渡河之初願。”（“史忠正公集”卷一，“自劾師久無功疏”。）當時防河之目的，則昭然若揭，洞若觀火了。事實上，在一六四五年三月之前，和史可法交戰的也根本不是清兵，完全是抗清的農民軍。史可法提議設四鎮的目的，也是爲了“但此時賊鋒正銳，我兵氣靡，備分則力單，願遠則遺近，不得不擇可守之地，立定根基，然後最圖進攻。臣酌地利，當設四藩”。（“史忠正公集”卷一，“議設四藩疏”。）其矛頭仍然朝着抗戰的戰士們。內外交患，背腹受敵的抗清農民軍，處在如此艱難時期，仍然以民族利益爲重，盡量避免與南明軍隊開磨擦，直到一六四五年二月，活動在徐州一帶的農民軍程繼孔部，還主動與宏光王朝聯繫，希望共同抗戰，但是却遭到史可法和高杰的慘殺。史可法因此加官進爵，晉太傅銜、蔭封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史忠正公集”卷一，“辭加銜疏”。）在民族戰爭激戰的年代，這樣慘殺抗戰志士，難道不是“因爲這類壞蛋，已經喪盡天良，當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的時候，他們還要開磨擦，開慘案，鬧分裂”嗎？（“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七一〇頁。）當李自成在陝西與清兵苦戰不勝，向河南東退時，史可法又馬上寫了“請緊急防守疏”、“請飭禁門戶疏”，聲稱“闖賊東逼，一矢未加，五夜捫心，恨不卽死”，而且立刻派劉良佐加兵河南，前去堵截。以上說明：在抗戰主力與民族敵人鏖戰之時，史可法所扮演的正是從背後截殺抗清農民軍的角色。在民族獨立遭到嚴重威脅的當時，史可法的所作所爲，與投降清兵的漢奸帶頭進攻農民軍的行動，其間究竟有多少本質的差別呢？

史可法對於抗清的愛國人民採取了如此兇殘的屠殺手段，而對於嚴重侵犯了民族利益的清代封建統治者，則採取了投降主義的政策。不管民族敵人侵犯了多少民族利益，他認為都無關大局，真正的敵人還是農民軍，他說：“先帝以聖明之主，遭變非常，即梟逆闖之頭，不足紓宗社臣民之恨。是目前最急者，無逾於辦寇矣”。（“史忠正公集”卷一，“請遣北使疏”。）在這種反動觀點的支配下，對於民族敵人，他強調和議，建議遣使北上，其目的倒不是割地賠款，而是要聯合清統治者合力鎮壓保衛祖國的人民戰士。史可法背叛民族的反動行動，在這裡就表現得格外明顯了。在這一點上，他和清統治者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清代封建統治者心裡非常明白，真正阻礙他們侵略行動的不是宏光王朝的軍隊，而是廣大的抗清農民軍，因此，他們接二連三地發佈檄文，希望與宏光王朝“戮力同心”，共同撲滅抗戰的人民武裝。攝政王多爾袞給史可法書信的全部要旨也在於此。兩個民族的封建統治者，在這裡就有了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語言。這充分證明了毛主席下面的論斷是英明的、偉大的、正確的：“在民族鬥爭中，階級鬥爭是以民族鬥爭的形式出現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五二七頁。）“民族鬥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美帝國主義種族歧視的正義鬥爭的聲明”。）只要我們牢牢地記住這個觀點，並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來考察歷史，我們就會明白，不論是漫長的封建社會，還是現代的資本主義國家，每當外來敵人入侵之後，這個國家的反動統治集團總是表現得那麼軟弱、卑怯，以至發展到投降、賣國的行爲。那管是南明的宏光王朝，還是偏安一隅的南宋封建統治，也不論是反動的蔣介石政府，都沒有任何例外。盡管他們所處的時代相去遙遠，環境也有所不同，但是他們所說的話所行的事

却同出一轍，然而他們的投降路綫，又不是表現得赤裸裸的，爲了迷惑人民，往往表現爲假抗戰，假投降，假愛國，真出賣，販賣了形形色色的曲綫救國論。更可法也沒有例外，他說“近地不靖，何暇遠征，內亂未消，安御外侮？”（“史忠正公集”卷二，“致給諫倪某”。）只要清兵能屠殺農民軍，管他侵犯了多少民族利益，都一概置諸腦後。“但既能殺賊，卽爲我復仇，予以義名，因其順勢，先國仇之大而特釋前嫌；借兵力之強而盡殲丑類，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數也。”（“史忠正公集”卷一，“請遣北使疏”。）而且視爲這是千載難逢之良機，“時乎，時乎，不再來矣！若夫彼操蚌之二子，我睡漁人之一枕，失今不圖，後將有不及圖者”。（“史忠正公集”卷一，“請進取疏”。）正因爲此，他對清代的封建統治有感恩不盡的一面，寫給多爾袞的書信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有人說這封信頌揚清統治者是假的，是不得不說的婉轉之辭。好吧！姑且摘引一些，看看是真頌揚還是假客氣。

“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捧琬炎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至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成（指李自成——筆者），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群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跪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治筐匪，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今逆成未伏天誅，諜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

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貴國義問，照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史忠正公集”卷二，“覆攝政睿親王書”。）

他說得十分懇切，相當真誠。還要怎樣說才算是真頌揚呢？他這種恩仇顛倒、親敵殺友的反動觀點至死沒有絲毫地改變。

史可法這個反動的觀點和行爲也是有歷史可查的。一六三八年清多爾袞、岳托曾率兩路大軍越過長城，侵略了河北、山東。當時史可法也曾率師北上，但是剛到達黃河北邊就退回來了，原因是“流寇復犯江北”，“近京與山左告急”，“不得已引軍還矣”（“史忠正公集”卷三，“家書五”。）這樣的史可法，到了農民軍滅明之後，能夠和清統治者聯合一起共同鎮壓抗清的農民軍，這難道不是很合乎邏輯的事情麼？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呢？遺憾的是「史可法」的編者一筆抹掉這些鐵一般的史實，盡力爲史可法塗脂搽粉，說他當時“苦心籌劃，堅決抗清”，“他一心爭取的只是整頓軍備，組織兵力，一致抗清。他成了南明政府抗清的中心人物。對於清國貴族的進犯和到處大肆燒殺，全國人民也懷着滿腔仇恨，決心反抗。因此，本來只不過有時候能夠得到人民同情的史可法，到這時候，他自己的要求已經與人民的要求相一致了，換句話說，在反抗清兵進犯的這一點上，他與人民站在一條陣綫上了。因而人民是擁護他、支持他的。”這豈不是在明目張膽地顛倒歷史真實，爲了達到歌頌史可法的目的，不惜任意歪曲，篡改歷史事實。很明顯，只要是他們認爲的“民族英雄”，必然是“與人民的要求相一致了”，他們的理論是：“盡管他們出身於貴族、官僚、地主階級，和人民是有矛盾的，但在保家衛國這一點上，却和廣大人民利益一致，他們的光輝業績，無數世代以來，都爲人民所謳歌、頌戴。”（吳晗：“學習集”

一〇八頁)他們所以要宣揚這個理論，目的在於製造出在封建社會有一種超越一切階級之上的“階級利益”，以此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提倡階級調和論，宣揚封建道德可以繼承。歌頌史可法爲民族英雄，是這樣，歌頌“清官”也同樣是爲了這個目的。

(四) 史可法爲哪個階級而死？

清兵入關時僅有兵力十餘萬人，當時南明的軍隊尚有五十萬人，如能同李自成、張獻忠所領導的六、七十萬農民軍聯合一起，驅逐清兵入侵，保衛民族獨立，是完全可以辦到的事情。正是由於宏光統治集團採取了聯合民族敵人共同鎮壓人民抗清武裝力量的極端反動政策，以致招來了亡國的大禍，廣大人民遭到了一次血腥的浩劫，民族的經濟文化遭到了嚴重的摧殘。歷史了腐朽勢力頑固派都是要走這樣一條路的：“頑固分子，實際上是頑而不固，頑到後來，就要變，變爲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七三一頁。）宏光統治集團的頑固派也是按照這條邏輯發展的，他們鎮壓抗清的農民軍，氣焰凶凶，不可一世，李自成的最後失敗，正是清兵與屯駐武昌的左良玉兩面夾擊所造成的。到了人民抗清的力量被他們聯合敵人暫時殘酷地鎮壓下去之後，民族敵人的槍口指向他們的時候，他們表現得束手無策，只能坐以待斃了。一六四五年三月，清兵以多鐸爲總指揮，開始向江南進軍，這時那些打內戰內行的宏光王朝將領們還在進行着一場混戰。左良玉順流東下，史可法率四鎮截江而戰，造成江北淮揚，千里營空，清兵如入無人之境。史可法的軟弱無力正表現在這裡，從他督師江北起，始終也沒有平息掉四鎮之間的攻